

李烈钧“请辞”背后的重重迷雾

讨袁斗士

李烈钧原名烈训,字协和,江西武宁人。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,不久加入同盟会,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。其后,举凡辛亥、讨袁、护国、护法、北伐诸役,他都亲身参与,功勋彪炳。其中,打响反袁世凯独裁第一枪的“二次革命”,就是由李烈钧发动的。虽然起义只有两月就遭失败,但对全国造成的影响却相当大。

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,孙中山、黄兴等被通缉,相继逃亡日本,李烈钧亦流落东瀛。不久,李烈钧回国,与蔡锷和唐继尧一起发动护国运动,继续举兵反对袁世凯称帝。两年后的1917年,李烈钧又参加了孙中山在广州发起的护法运动,任大元帅府总参谋长,积极为北伐做准备。可以说,李烈钧一直追随孙中山,是其左膀右臂。

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,李烈钧身兼国民政府常委和军事委员会常委,跻身最高领导核心,甚至一度坐镇中枢,主持政务。不曾料到,一度叱咤风云的李烈钧竟会突然退隐。他究竟为何请辞?个中缘由说起来有点头绪纷繁。

蓄意排挤

从辞呈来看,理由是身体欠佳,需要休养治疗。李烈钧的健康确实出了问题。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,让李烈钧颇不堪重负。大约从1924年起,他就患上心血管方面的疾病,曾数度谈及“身体孱弱”,需要静养。

可问题来了,李烈钧患病已有多时,且一直公务缠身,于百忙中丝毫未

见有何不适;而离职时身体亦无明显病变,却以此为由请辞,不免令人疑窦丛生。身体不佳固然是事实,但还不至于影响到他的工作,或另有难言之隐不便启齿。

如果不是因病的话,那就可能与一年前的“复成桥惨案”有关系了。所谓“复成桥惨案”,是1927年11月22日南京各界举行讨伐唐生智胜利庆祝游行,当队伍行至复成桥时遭遇枪击,多人伤亡。其时,蒋介石已辞职,由李烈钧主政,他似乎对此有长官连带责任之嫌。

不过李烈钧倒是勇于担责,于事发当日公开呈请国民政府,文中表示“咎有应得”“敬请处分”。未几,事态平息,未再深究,毕竟此事与李烈钧并无直接关联。

可一年过后,竟然有人翻出陈年老账,拿这说事。另一位国民党大佬胡汉民就声称李烈钧是“复成桥惨案”的负责人,政府不惩办他,算是宽大了,此人尚可乎用乎?此言是意在追究,还是“敲山震虎”,抑或兼有?总之,这一损招让李烈钧内心纠结,颜面大失。

不过,这虽然对李烈钧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,但他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,处乱不惊的他应该不会被这件事轻易唬住。

那么,辞职一事必然另有缘由,这就牵扯到了蒋介石。作为国民党功勋元老的李烈钧可能是因为遭到蒋介石的蓄意排挤,心境难平,遂愤然辞职,以示不满。此言并非空穴来风。若问蒋介石为何要倾轧李烈钧,这就说来话长了。

玩弄权术

1927年4月,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,一时大有问鼎天下之势。可仅仅过了四个月,在武汉方面和桂系“逼官”的双重压力下,他凄然下野。与蒋同进退的一帮国府要人都去职离京,只有李烈钧等极少数人继续留任,与桂系共同主政。蒋介石当然不希望看到“二李”(李宗仁、李烈钧)通力合作,于是就有意拉拢这位军界大佬。他从上海致电李烈钧,暗示李烈钧离京赴沪,与其共谋。

其时,“五省联军”总司令孙传芳的部队正挥师南攻,一时间南京城风声鹤唳。面对这种情况,李烈钧岂能临阵弃任,他固守金陵,最终挽救了国民政府,也造就桂系成为一支与蒋介石争雄的重要力量。可以想见,蒋介石对其心存不满是毫无疑问的。他在1928年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“李烈钧捣乱腐败如此,何能革命也”,表达对李氏不与他相向而行的不悦,并用了“捣乱腐败”这样的批判之语。

不唯如此,宁汉争斗,蒋介石下野,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,与谭延闿、何应钦、李烈钧等人联手相助,控制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,改组了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。不久,蒋、汪两大巨头彼此妥协,决定一致对外,蒋宣布复职,并提出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预备会。当时各派均有意会商,遂做顺水人情。唯独李烈钧“不识抬举”,他在“复在沪国民党要人电”中,表示对会议的召开不抱有希望,因为蒋、汪等人毫无

信义可言,无非是各怀鬼胎的一次政治分赃。

李烈钧的表态让蒋介石很是难堪,又岂能不心存芥蒂?

蒋介石复职后首要之事是继续“二期北伐”,以便“一统天下”。此举必须倚重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。李烈钧与冯、阎颇有交谊,蒋介石便亲自登门拜访,请他出任北伐军参谋长一职。

李烈钧自有考量,一来他长期担任孙中山的总参谋长,孙去世后,他不愿复任此职;二来,在国民党军史上,他的资历远在蒋介石之上,故不愿屈就;三来,在国民党内的纷争中,他已看出蒋介石排斥异己,独揽大权,所以不愿让自己成为被利用的工具。因此,李烈钧一口婉拒,得罪了蒋。

1928年8月8日,南京国民政府改组,蒋介石复任国民政府主席,独揽党政军大权。其他一些重要人物也都“对号入座”,唯独老资格的李烈钧明显遭冷遇。自国民党开府广州以来,李烈钧一直享有尊荣,是历届国民政府常务委员,并且连任。然而在这次会议上,他是国府委员中唯一一位“出局”者,几乎等于“就地免职”。

同时,胡汉民旧事重提,以“复成桥惨案”为借口,搬弄是非,混淆视听,为蒋辩护帮腔,显然是有备而来。明眼人一看便知是蒋介石在玩弄权术,有意排斥李烈钧。李烈钧气不过,却又很无奈,也只能顺时应变,于两月后“自辞”,悄然离开南京,归隐沪上,从此淡出政坛。

据《名人传记》韩文宁/文

妈妈林徽因的最后时刻

本文作者梁再冰是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的长女,1929年生于北平,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西语系,后担任新华社记者,1991年退休。本文记述了1955年林徽因去世前后,对丈夫、儿女的深情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,因为清华的教工住宅没有暖气,冬天要靠烧煤炉来取暖,病弱的妈妈又格外怕冷,家中必须要生三四个约半人多高的大炉子,全靠爹爹添火管理。繁重的工作和家务,让爹爹的身体也渐渐扛不住了,后来组织上便安排他们搬到城里,在西单附近一处小院住,条件稍好一些。整个小院虽然有暖气,但是烧起来非常热,不烧又非常冷,很难控制,结果,妈妈的病反而更严重了。

1953年夏天,我结婚成家。第二年,我怀孕了。一天,我去小院看他们,妈妈忽然从床下拖出一只白瓷大盆,说是她给我的孩子准备的,里面有一大摞她亲手缝制的婴儿被子和小衣服,她拉着我的手气喘吁吁地说,希望我能喜欢她的手艺。母亲为我准备的这些,我一直用到了第三个孩子出生。

1955年,我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时,妈妈住进了同仁医院。因照顾病重的妈妈,爹爹的身体也垮了,同时也住在这个医院。

我在孩子满月后立即赶到医院去看她。一个多月未见,我一见到妈

妈,立即从她的脸色上感到,她快要离开我们了。来到病床前,妈妈见到生产后的我却是一副极为欣慰的样子,她高兴地对周围的护士说:“你们快看我的女儿,她的身体和脸色多好啊!”

这时,她似乎忘了自己的病痛。我记得她当时还问我,她想坐起来梳头,可不可以,其实她已经没有力气可以坐起来了。我想把孩子抱去给她看一看,可她是肺病,医院说婴儿无论如何不能进病房。后来实在没办法,我同爱人抱着孩子赶紧去西单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,想给她看看外孙。可惜的是,当时洗相片的速度很慢。终究还是没有赶上。

1955年3月31日晚上,同仁医院打电话到新华社通知我:妈妈病危。我来到她的病床前时,护士问我要不要叫隔壁的爹爹过来。我像疯了似的喊道:“要,要啊!”护士把爹爹搀过来时,他坐在妈妈床前,拉着妈妈的手放声痛哭。我一生从没有见过爹爹如此流泪,此时他一边哭一边喃喃不断地说:“受罪呀,徽,受罪呀,你真受罪呀!”

那一刻我觉得,他们的关系是如此紧密,在他们生离死别的这一刻,任何“外人”,哪怕是我,也不能打扰他们的诀别。

据《梁思成与林徽因:我的父亲母亲》梁再冰/口述于葵/执笔